

广义叙述学



现实主义范式转型影响下的不可靠叙述^{*}

王 悅

摘要：不可靠叙述广泛存在于现代文学作品中，而在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却比较罕见，这一现象或许说明叙述可靠性与现实主义范式之间具有某种内在关联。为探究这一问题，本文聚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文学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以转型期的关键人物亨利·詹姆斯的理论和创作为依托，探讨现实主义范式的转型如何影响叙述可靠性，以及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不可靠叙述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不可靠叙述，现实主义范式，亨利·詹姆斯，印象，视角

Unreliable Narrativ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nsition of the Realist Paradigm

Wang Yue

Abstract: Unreliable narrative is a very common feature of modern literature that is rarely seen in traditional literature, which may suggest some sort of internal relation between narrative reliability and the realist paradigm. Focusing on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ism to modernism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and based on the

* 本文为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不可靠叙述’前沿问题研究”(FJ2019C020)的中期成果。

theories and fictions of Henry James, a key literary figure of the perio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narrative unreliability, and describe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unreliable narrative as a historical phenomenon.

Keywords: unreliable narrative, realist paradigm, Henry James, impression, point of view

DOI: 10.13760/b.cnki.sam.202201011

不可靠叙述（unreliable narrative）由韦恩·布斯提出至今，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叙述文本中主体分化、距离控制、反讽传递等复杂叙述现象的理解，对叙事学的研究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关于不可靠叙述的研究多以20世纪以来的叙事作品为文本对象，这当然与现当代文学中不可靠叙述手法的广泛运用有关。但这似乎也引出一些问题：20世纪以前的传统文学为何较少出现不可靠叙述？不可靠叙述与文学的现代性有关联吗？这种整体意义上的叙述可靠性的变化背后又有什么历史文化层面的缘由？

事实上，纽宁曾指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小说很少有不可靠的叙述者，部分因为“不可靠叙述质疑的认识论前提这时还普遍被接受”（Nunning, 1997, p. 92），换言之，叙述的不可靠或许与社会文化体系对现实主义范式的质疑有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理念遭到冲击，现代主义文学思想萌芽，这种文学范式的转型是否影响了叙事的可靠性，进而导致不可靠叙述成为现代文学中一种常见的叙述现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认为，对这一时期呈现出过渡状态的文学理论和创作进行考察，有助于深入剖析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鉴于英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在转型期对小说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接下来，本文试图以他的理论和创作为焦点，探索这一叙事现象与现实主义范式演变之间的交集。

—

致力小说形式自律的亨利·詹姆斯一直被视为传统文学向现代主义文学转变的关键人物，他提出的“视角”（point of view）、“媒介”（medium）、“提线人物”（ficelle）、“场景系统”（the scenic system）等理论与他的小说创作实践一起，对现实主义范式的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亨利·詹

□ 符号与传媒（24）

詹姆斯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这一概念时，就重点分析了他的小说文本：“这些作品中的故事，不论是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述的，其叙述者都是一种极端混乱的，基本上是自我欺骗的，甚或是刚愎自用的、谬误的反映者。”（1986，p. 378）这种叙事现象与19世纪主流的现实主义叙事方式有明显的不同。

例如，他的《阿斯彭文稿》（*The Aspern Papers*）就是一篇不可靠叙述的典型范例。这篇小说在叙事手法上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文中两种叙述声音的不一致。叙述者“我”在小说中的行为无疑是很不光彩的，他堂而皇之地为了手稿行骗、偷盗，却认为自己做的这一切都是受到了诗人阿斯彭的“精神”感召——“这种精神经常伴随着我，似乎从那位伟大诗人复活了的不朽的脸上朝外注视着我——那张脸上闪现着他的全部才华，诗人就是鼓舞着我的力量。”（詹姆斯，2011，p. 54）在叙述者的想象中，夺取文稿这件事为艺术服务，其本质与阿斯彭的创作是一致的，于是他感到诗人也跟他在一起，“兄弟般亲热地一起负责这件事儿”（p. 55）。

叙述者所说的“这种精神”，在小说中弥漫成一种怀旧的氛围，即阿斯彭的画像所指证的、“一个詹姆斯可以自由支配的、用全部诗的艺术技巧来加以记载和造访的过去”（布斯，1986，p. 396）。这种在幻想中被赋予神圣意味的怀旧氛围与实际中充满算计的阴暗氛围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读者会发现，叙述者采取行动时，步步为营、不择手段地想方设法得到文稿，毫无艺术追求的使命感可言，恰如茱莉亚娜所说，他是“一个出版界的恶棍”（2011，p. 152）；而叙述者进入主观想象时，又会营造出一个诗人所代表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世界。这种叙述声音的分裂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注意，如布斯认为这种叙述态度的不稳定是非人格化叙述的代价之一，常常会导致意义的含混（1986，p. 382）；格雷厄姆认为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能让读者在故事情节中自由出入，也体现出文学创作中把握人物主客观世界平衡的“内在困难”（Graham，1975，p. 59）；毛亮认为这种分裂的用意在于建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文学共同体”（2015，p. 116）；等等。

可以看出，理解《阿斯彭文稿》中叙述者声音的复杂化是阐释这部作品的关键。一方面，叙述者不断向读者表明自己的心迹。另一方面，隐含作者又让我们认识到主人公所处的世界与其主观想象之间的矛盾——威尼斯的老宅不是阿斯彭“复活的肉身”，而是“冷漠而又谨慎”的破败宅院；茱莉亚娜不是阿斯彭诗歌中的女神，而是个贪财的、不体面的老太婆；蒂娜答应帮他的忙不是因为上了他的当，而是另有自己的打算……作者为读者提供了一

个不可靠的叙述者，他的令人生疑的叙述口吻与真实可见的细节一起，构成了詹姆斯笔下别具一格的现实主义。

生活于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之间的詹姆斯，对于文化大潮中现实主义范式的转型有着敏感的意识。同期重要的美国作家豪威尔斯认为，“现实主义的唯一要求就是忠实，对生活的忠实是现实主义的首要原则”，“现实主义是对材料不多也不少的忠实处理”（Ahnebrink, 1961, p. 132），把真实、客观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根本，这种观点在当时的文学界占据主导地位。而深受绘画艺术影响的詹姆斯一方面强调“一部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它的确试图反映生活”；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观念的是，他看到了“真实”本身的复杂性——“人性是无边无际的，而真实也有着无数形式”。他借用印象派绘画的理念，提出：“一部小说按它最广泛的定义是一种个人的、直接的对生活的印象”；“我们瞥见的是（生活的）一个图像，它在时间上绵延成一个时刻，那一时刻就是我们的经验”。（James, 1962, p. 35）对现实的客观书写被印象的叠加替代，注入了主观色彩的现实开始变得模糊而不可靠，由此在小说反映现实的层面出现了一种现代主义意识。

保罗·阿姆斯特朗在《亨利·詹姆斯的现代性》中指出，詹姆斯的艺术理论一方面要求作家立足于现实；另一方面又强调现实的不可靠性，表明“詹姆斯一只脚在 19 世纪，另一只脚在 20 世纪”（Armstrong, 2017, pp. 208 – 209）。以《阿斯彭文稿》为例，小说叙述了一个线索清晰的完整故事：情节围绕主人公想方设法地求取文稿展开，但在一开头，读者就掉入了“我”暧昧不明的叙述氛围中——“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了普雷斯特夫人。说实话，没有她的帮助，我是不会取得多大进展的；因为整个这件事的富有成果的想法，就是她亲切友好地提出来的。”（詹姆斯, 2011, p. 1）小说由一个不加以解释的“秘密”开头——“我”和普雷斯特夫人商量的“作战计划”带有一种阴谋的味道。随着故事的推进，叙述者让读者在头脑中看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追随叙述者的视角，读者可以看到威尼斯的老宅一会儿是叙述者敬仰诗人的殿堂，一会儿又成为他贪婪渴求的猎物。小说所反映的现实依存于叙述者头脑中的印象，也就是说，对“真实”（the real）的反映在詹姆斯这里变成了对“真实的氛围”（the air of reality）或“生活的幻觉”（the illusion of life）的塑造，这成为詹姆斯的小说创作思想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代显梅, 2006, p. 110）

我觉得真实感（细节刻画的实在性）是一部小说的最重要的优点，所有的其他优点（包括贝桑先生所谈到的那个自觉的道德目

□ 符号与传媒（24）

的）都无可奈何、俯首听命地依附于那个优点。如果它不存在，它们就全都等于零，而如果这些存在，那么它们的效果归功于作者创造生活的幻觉所取得的成功。这种成功的取得、对这个微妙的过程的研究，按照我的趣味来说，就构成小说家艺术的开始和终结。
(詹姆斯, 2007, p. 306)

可以看出，詹姆斯对“真实”的理解已经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客观实在性、道德目的等传统现实主义范式最为看重的方面，在詹姆斯这里为“生活的幻觉”所取代。而“生活的幻觉”即印象的集合，是“真实”基于有意识的形式自律的表现，它不同于西方传统美学观念中的再现，就其以直觉的方式呈现世界的层面而言，它更接近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表现主义。正因如此，詹姆斯在讨论印象的质量高低时，使用“强度”这一中性的概念作为衡量的标准，无关乎真假、善恶等价值判断，而将反映现实的水准与形式创造的艺术性结合起来。

詹姆斯说过：“（小说里的印象）没有强度就没有价值，但强度来自个体能自由去感受，自由去言说。”(James, 1962, p. 33) 艺术自由论是詹姆斯小说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但是，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如何实现自由？艺术自由论和现实主义理念是相悖的吗？詹姆斯以不可靠叙述的方式完成了两者的统一。“真实的氛围”不等于“真实”，每一处现实都是源自人的品性、眼界、欲望而生成的“心像”，这些缘于印象的现实可能是善变的、模糊的、不可靠的，它们不遵照客体自身的因果律，不固守某一种社会陈规或习俗，只是散漫地再现主体心灵对于现实的真切感受。这就将“真实”还原为无需加工整合的“自由”。毫无疑问，这种自由是主体性介入客体性的结果，它使不可靠的叙述成为贴近艺术自由的重要途径，并通过这种方式将摹写现实拓展为豪威尔斯所说的“对人性的研究”。(Gard, 1968, pp. 132 – 133)

放入当时的文化语境中看，詹姆斯对于艺术自由的强调、对于叙述真实的重新定义都是在倡导小说的形式自觉。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仍被视为一种不严肃的文艺样式，民众对它的态度是要么将其作为通俗娱乐，要么因其社会感染力而强调道德教谕作用，无论哪一种态度，都没有对小说的艺术形式加以重视。詹姆斯认为，对小说形式的忽略已经严重影响到英国小说的发展，使其有沦为平庸文化代表的危险，而对抗平庸化的方法之一，就是避免让叙述主体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多大程度上艺术呈现的生活是未加工过的，我们就多么近地接近真实；多大程度上我们见到的生活是被加工过的，我们见到的就是生活的替身、妥协和俗规。”(James, 1962, p. 39) 取

消所谓可靠的正确声音，让现实呈现为每个人眼中充满偏见的感知世界，不可靠的叙述看似所言不实，却在另一个层面上拥有了比传统写实手法更贴切的真实，这种效果是与现实主义范式的转型相伴而生的。

二

詹姆斯将小说定义为“个人的、直接的对生活的印象”，在小说中“制造生活的幻觉”，这些理论与他的“视角”概念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视角”这一概念虽然由李斯特（Thomas Lister）首创，却由詹姆斯最先系统地对相关理论加以阐述。在《专使》的前言中，詹姆斯把视角称为小说的“主要规矩”，“在这一主要规矩面前，任何其他的形式问题都会黯然失色”（Edel, 1984, p. 1325）。事实也如他所言，叙述视角成为20世纪小说形式理论中的核心问题，直到今天也是我们理解小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詹姆斯说过：“只要是对生活的直接印象，任何视角都是有趣的。你们每个人都有受个人情况影响的印象，将它变成一幅图画，一幅由你的智慧构成的图画，那就是对美国社会的洞察。”（James, 1934, p. 29）视角来源于对生活的印象，直接的真实是难以探求的，我们只能在有限的经验/印象中捕捉个人眼中的真实。“詹姆斯为小说家的创作权勾勒了两种互相竞争的理念：一方面，成功的小说家应能以最透明的方式来表现其对生活的独特印象；另一方面，成功的小说家不能允许其本人的观点来阻碍生活对他产生印象。”（Hale, 2000, pp. 84–85）为更加纯粹地在小说中展示印象层面的真实，詹姆斯反对传统小说中的全知视角（the omniscient point of view）叙述，认为这一类叙述者对叙述的随意介入破坏了艺术的完整性，这种干涉即使算不上是“特权的滥用”，也称得上是“知识的滥用”。（Edel, 1984, p. 1299）他主张采用人物的有限视角（the limited point of view），让叙述呈现在某一视角人物的感知领域中，“至关紧要的是主人公的视野、他所关心的事物以及他对这些事物所做的解释……其他人物的经验只有在跟他发生接触以后才和我们有关——只有在得到他的辨认、感知和预见的前提下才进入我们的视野”（Edel, 1984, p. 1065）。叙述者的功能由此被限制，小说叙述在更大程度上成为视角人物经验的体现。

视角问题的提出是小说形式研究的一大进步，传统小说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诠释新教伦理的义务，所以总是带有鲜明的道德目的，采用全知视角有利于叙述者更方便地对叙事内容进行评判和管控；有限视角叙述尽量限

□ 符号与传媒（24）

制叙述者对故事的干预，让一个或多个角色作为意识中心，将故事情节如戏剧般地展示出来。詹姆斯说：“小说家在小说这栋大厦中的位置最多只是站在窗口观看而已。”（James, 1934, p. 46）现代小说家们认为这种直接展示现实的方式更有助于维持现实主义幻觉的强度，一些批评家甚至将“展示”（showing）与“讲述”（telling）的区分视为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泾渭分明的标志。（布斯，1986, pp. 2-3）

有限视角的运用开启了现代小说形式多样的叙述实验，增强叙述的不可靠性可谓其中卓有成效的一种。詹姆斯塑造了为数众多的不可靠叙述者，有第一人称叙述者，如《阿斯彭文稿》中的“我”，通过叙述声音的分歧与矛盾体现叙述的不可靠性；也有第三人称叙述者，如《一位女士的画像》《梅西知道什么》《专使》中的叙述者，虽然话语由叙述者来说，却是通过视角人物的眼睛来看，反映的是人物的经验与意识。由于人物自身的认知能力有限，他（她）的有限视角叙述常常就是不可靠的，而这种不可靠由于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者的语言，就造成了一种“看”与“说”之间的张力，其不可靠叙述与具有道德或认知缺陷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相比，又别有一番意趣。

以《梅西知道什么》（*What Maisie Knew*）的不可靠叙述为例。小说通过小女孩梅西的视角展开情节，詹姆斯在作品的序言中特意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小孩子有许多观感，却缺乏足够的词汇去描述；任何时候，他们的视野比他们能脱口而出的词汇更为丰富，理解力更强”；“小女孩的感受力是不容置疑的，年纪越小，感受力越强，从我的主人公的角色来看，我的计划需要‘无穷无尽的’感受力”。（Edel, 1984, p. 1159）因此，小女孩特有的感受力被詹姆斯用来作为透视生活的“滤镜”，成人世界的虚伪与肮脏在这副滤镜下面以令人惊异的清晰度反映出来；同时，为了更便于把镜像完整地呈现给读者，詹姆斯没有采用孩童的第一人称叙述，而是用成年人优雅而成熟的语言，将孩童眼中的世界加以再现。

如小说一开头，叙述者就写出了梅西眼中正处于再婚蜜月期的妈妈的样子：浓妆艳抹，来去匆匆。小女孩梅西对妈妈是信任的，她只看到“她的穿戴衣着犹如要外出旅行”“衣服开得越低，走得就越仓促”，却不明白如此穿戴是因为妈妈只是在赶赴宴会途中顺路来看她，她的重要性远远排在妈妈的享乐之后；她也听不出威克斯太太说妈妈的打扮“犹如一幅窗帘”背后的嘲讽意义，不知道妈妈对她的态度“爱走极端”的原因。借用梅西的视角，叙述者展现了一个孩童眼中的成人世界——她的纯真使她无法了解大人行为背后的自私与虚伪，这需要叙述者在用成人语言叙述的同时，在感知及判断层

面保持低于成人的孩童水平。詹姆斯·费伦曾将不可靠叙述的表现形式划分为三大轴上的六种亚类型：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Phelan, 2005, pp. 49–53) 就《梅西知道什么》而言，以儿童作为视角人物的叙述至少使叙述者在后两类轴的层面上存在着不可靠的表现。正处于“一个所有的故事都是真的，所有的构思都是故事的年龄”的梅西在认知程度上的不足给隐含作者留下了反讽的空间，于是我们从小说一开头就能感受到梅西母亲的不负责任，孩子的天真与信任恰恰放大了成人性格中不堪的一面。

这部小说是一部成长小说，主人公成长的过程正是视角感知与叙述语言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的过程。从一开始梅西毫无芥蒂地告诉母亲，父亲说她“是一头令人作呕的讨厌的猪”时，她对母亲的本质还没有任何意识，只是本能地感到对方的冰冷与虚伪——“下一刻梅西就躺在了妈妈的胸前，在挂满一堆小饰品的怀抱中梅西突然觉得自己仿佛打碎玻璃店门强行闯入了珠宝店内”(James, 1985, p. 85)。后来，她意识到自己“一直就是一个携带侮辱的信使”，决定“不再被利用了，她要忘掉一切事情，不再复述任何事情”时，她开始用她有限的认知去观察和解读周围的一切，“一点一点的——她懂得更多，因为她受到李瑟特所提问题的启发”，明白“每一件事背后都有某些事情：生活就像一个长长的走廊，两边有一排排关闭着的门。她已学会在这些门前最好别去敲门”(1985, p. 54)。最终，在周围大人的“拥抱”和“推攘”的不断交替中，“这个意识越来越丰富的小脑袋已经感觉到历史重复的一种方式”，每个人都是在需要她时拥抱她，利用完就立即推开。她决定以成人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提出交易条件，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虽然没能成功，却标志着她已提前结束童年时代，这时梅西眼中的世界已与叙述者的认知没有明显差别。

从《梅西知道什么》的小说标题就可以看出，梅西的视角是这部小说的表现重点。通过小说的叙述，我们不仅了解到她的母亲、父亲、克劳德先生、彼尔夫人、威克斯太太之间的感情纠葛，更重要的是了解到那双观察他们的眼睛——梅西，究竟知道什么，理解到什么程度。历来对这部小说的研究都聚焦于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之所以难有确定的答案，就缘于作者所采用的这种不可靠叙述。有限的人物视角是叙述者的自我限制，采用儿童作为视角人物使叙述者不仅需要限制感知范围，还要限制感知的程度和层面；而以成长的方式进行视角叙述，更带来了叙述者自限程度的变化，这些无疑

□ 符号与传媒（24）

都增强了判断叙述可靠性的难度。

对于视角人物，詹姆斯在不同场合下冠名为“媒体”“镜像人物”(reflector)或“意识容器”(vessel of consciousness)等，他曾对之做出过如下分类：“有被蒙在鼓里的，有懵里懵懂的，有智力刚够用的，也有我们会称为还算聪明的那一类；与此形成对照的有观察敏锐的、反应强烈的、心智健全的……一言以蔽之，后者具有明察秋毫的洞察力以及高度的责任心。”(Edel, 1984, p. 1088) 詹姆斯提倡选择后一类作为视角人物，因为后者“是我们唯一可以信赖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不会违背、损害或丢弃作品中具有价值和美感的那些东西”，“有助于客观地记录所发生的一切”。(Edel, 1984, p. 1093) 但在实际的小说创作中，我们看到詹姆斯笔下各种有缺陷或偏见的视角人物往往更有艺术感染力——既表现了生活，也反映了“意识容器”的人性。詹姆斯可能没想到，这类不太可靠的视角人物在现代小说中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运用，在这一方面，他既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也体现出了“一只脚在19世纪，一只脚在20世纪”的特征。

三

在詹姆斯诸多的不可靠叙述文本中，《螺丝在拧紧》具有最强的争议性。这个故事拥有复杂的叙述层次：第一叙述层的叙述者是“我”，没有直接参与故事，而是把从道格拉斯那里听来的故事转述给读者；第二叙述层的叙述者是道格拉斯，他也没有直接参与故事，而是向围坐在火堆前的听众们（包括“我”）朗读他所爱慕的女教师的故事，并从一开始就为这个故事定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基调；第三叙述层才是小说的主叙述层，女教师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了她与两个孩子之间发生的故事。很明显，前两个叙述层与主要故事情节之间并没有必要的联系。那么，詹姆斯创造作为引子的叙述层次叠加意义何在？费尔曼在其关于这部小说的著名论文《解释的螺丝在拧紧》(“Turning the Screw of Interpretation”)中指出，这个引子并非像传统故事那样赋予主叙述层一个确定的起源，相反通过三个不同的叙述者将“起源”转化为“对起源的遗忘”(a forgetting of its origin)，造成无限的延宕。“通过序言的阐释螺旋，这个故事实际起源于一个不断丧失自身起源的框架之中。”(Felman, 1982, pp. 121 – 122) 也就是说，看似关系不大的前两层叙述，已经为整个文本叙述的不可靠性埋下了伏笔，对于故事起源的层层详述成为对自身的解构，同时也暗示了故事主体意义的失落和延宕。

《螺丝在拧紧》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对于叙述文本的不可靠性解读本身也是不可靠的。在这个中篇故事的主叙述层中，叙述者“我”受一位风度翩翩的单身绅士聘用，为他的两个失去双亲的侄儿当家庭教师，并附加条件“永远不能打扰他”。“我”因此来到了鬼影幢幢的布莱山庄，意外地发现了前任女教师杰赛尔和前仆人昆特的幽灵，更为可怕的是，这两个幽灵与两个孩子纠缠在一起。“我”试图与幽灵抗争来拯救孩子，但孩子表现出不同于他们天使般外表的另一面，似乎与幽灵之间有不可告人的隐情，最终，小男孩麦克斯失去了性命。

这样一部哥特式小说在问世之初引起的反响并不大，人们虽然觉得情节诡异，却没有怀疑过叙述者所述故事的可靠性。直到1934年，威尔森发表著名论文《亨利·詹姆斯的模棱两可》（“The Ambiguity of Henry James”），以弗洛伊德的理论推翻了这部小说中女家庭教师的叙述，认为“这个被塑造出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女教师是一个性压抑的神经症患者，而幽灵也并非真的幽灵，不过是这个女教师的幻觉而已”（Wilson, 1948, p. 102）。这一结论掀起了文学批评界热烈的争论，同时也引发了批评家们对这部小说极大的阐释热情。人们发现，这部小说诡异的叙述语调竟能够容纳意义南辕北辙的两种解读——小说中声称见过幽灵的只有女教师一人，如果她的叙述是不可靠的，那么幽灵可能只是她的幻觉，而其他人对于是否有幽灵的模棱两可的说法又都可以作为其叙述不可靠性的证据。威尔森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把女教师的幻觉解释为源自对男主人的性压抑，于是昆特成为主人的投影，杰赛尔成为女教师自身的投影，女教师的叙述成为对弗洛伊德及拉康主体分裂理论的印证，有效地使小说中许多诡异隐晦的情节得以自洽。同样，正是因为小说中有太多的模棱两可，将女教师的叙述作为可靠叙述来理解也完全行得通：幽灵可能是存在的，格罗斯太太确实如叙述者所说是支持、认同她的，幽灵对孩子们的侵蚀也是真的。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在《螺丝在拧紧》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并都能够描绘出一幅完整的阐释图景。

正因如此，关于这部小说的批评研究几乎每隔几年就会结集出版一次，这部小说已经成为文学反映现实之不确定性的典型代表。事实上，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很难说清这些问题：幽灵是不是真的存在？两个小孩子是清白无辜的还是幽灵的同伴？女教师的叙述是真实可信的还是出于臆想？她的叙述动机是什么？因为文本本身意义含混，有研究者甚至解构了文本固定意义的存在，将小说叙述视为一种在作者、读者与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下歧义的共存。“我们阅读《螺丝在拧紧》与其说要捕捉这个神秘故事的答案，不

□ 符号与传媒（24）

如果说要追踪它意味深长的逃逸路径；与其说要解决或回答文本中令人困惑的问题，不如说要调查它的结构；与其说要指出或辨明这个文本中的歧义，不如说要理解这种文本性的歧义存在的必然和修辞功用。支撑这种阅读的问题因此不是‘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而是‘这个故事的意思是怎么表达的’。”（Felman, 1982, p. 119）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扭转了这部小说的阐释方向。

换一个角度而言，《螺丝在拧紧》的艺术魅力或许恰恰在于它所表现的生活层面的不确定性。不可靠叙述为它拓展了阐释空间，让意义的指称突破单一、走向多元，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体现现实主义——现实本身就是没有确定答案的，每个人眼中的世界不同，生活都是在每一个体的印象经验中展开的——在这一层面上，詹姆斯对现实生活不确定性的表现又回应了他的印象主义文艺理念。这似乎是詹姆斯式的现实主义必然要面临的发展方向：当“真实”被“生活的幻觉”取代，后者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意义的含混，以致詹姆斯在小说创作中“似乎只表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小说必须表现生活，然而，小说又不可能表现生活”（Perosa, 1978, p. 103）。从不可靠的叙述走向不可靠的不可靠叙述，现实主义的立场与消解现实主义的力量共存，体现了处于转型期的詹姆斯创作中的现代意识。

与 20 世纪的现代主义作家们不同的是，詹姆斯虽然在现实主义书写中发现了现实的不确定性，但并没有将现实的不可捉摸或虚无感作为作品的基本主题，而是试图在艺术真实的框架中建构一种生活的新秩序。在 1903 年纽约版的《小说的艺术》中，詹姆斯将小说的存在价值由“它能够与生活竞争”改为“它试图反映生活”，重新回归了传统现实主义模仿自然的本位，充分体现出詹姆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摇摆——“生活的幻觉”究竟是来源于生活，还是来源于幻觉？当小说与生活展开竞争，艺术真实独立于生活真实时，叙述的可靠性似乎必然会消解，所谓“生活的幻觉”就有沦为“主观的幻觉”的危险，这是自认为秉持现实主义理念的詹姆斯所不能接受的。

于是，我们在詹姆斯的小说中常常会看到各类游走于不可靠边缘的叙述者或人物，他们的存在不是如现代文学中那般为了呈现世界的无意义与非理性，而是作家在反映生活时困惑于现实的不确定性的结果。在《卡萨马西玛公主》中，叙述者常常用这样的语言进行叙述：“我们无法知道海恩辛斯……”“我不能确定亨宁小姐为什么这样……”“我们没办法准确地知道……”有关历史事件的叙述在叙述者犹疑的语气中消解了可靠性，我们无法直接在含糊的叙述中获知一个确定的现实。作者一方面细致描写那些政治阴谋与秘密活动，一方面又将其全部融入主人公的“看”与“被看”中，以

至于“《卡萨马西玛公主》的中心不是即将到来的革命，而是读者颇为熟悉的詹姆斯式的意识主题”（Anderson, 1977, p. 126）。这种细节纹理的清晰和主题意蕴的含混成为詹姆斯中后期小说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在《大使》《鸽翼》《金碗》等作品中，作者都塑造了一个与实际世界相对照的社会真空环境，人物以高度艺术化的方式重构周边的现实，多角度的观察、印象、感悟渗透进叙述的方方面面，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同时，传达出反映现实的不可靠。难怪乎有研究者指出，詹姆斯后期的小说让人觉得“小说形式被用来质疑小说自身，与自己进行‘较量’……似乎在塑造、建构它的同时在我们眼皮底下摧毁了它”（Perosa, 1978, p. 103）。

詹姆斯的小说和理论典型地体现了现实主义范式转型期的文学状态。以詹姆斯为代表，文学正从道德教谕的功用中走出，转而追求一种独立艺术的形式自觉；反映在叙事艺术上，叙述者不再仅仅是隐含作者的传声筒，而是以种种“不可靠”展现个体眼中“生活的幻觉”，赋予叙事艺术更大的张力与自由。这种对于叙事可靠性的拆解虽然不是他们的初衷，却暗含在他们的理论诉求之中，与现实主义范式的转型相伴而生。甚至于，他们的理论未必完全涵盖了小说实践中的先锋意识，从对多样化不可靠叙述者的塑造，到对可靠叙述是否存在本身的追问，文学的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命题已经呼之欲出，不可靠叙述形式在文学大潮中成为主流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以威廉·詹姆斯来透视不可靠叙述与现实主义范式转型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叙事形式在转型之后的现代主义文学中大行其道，有它内在的必然性。19世纪成熟的现实主义范式中毋庸置疑的认识论前提，使得叙述的可靠性几乎不曾成为一个问题，而随着詹姆斯等人在文论中对于“真实”“视角”“印象”等概念的深入辨析，小说艺术的形式理论得到发展，推动现实主义范式从“反映什么现实”向“如何反映现实”转变，不可靠叙述既是这一转变的产物，也为后来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不可靠叙述不仅仅是一种叙事策略，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折射出了文学思潮转向的印痕，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引用文献：

- 布斯，韦恩（1986）. 小说修辞学（华明，胡苏骁，周宪，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代显梅（2006）. 传统与现实之间：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理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毛亮（2015）. 自我、自由与伦理生活：亨利·詹姆斯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符号与传媒 (24)

- 詹姆斯, 亨利 (2011). 阿斯彭文稿 (主万,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 詹姆斯, 亨利 (2007). 黛茜·密勒 (赵萝蕤, 巫宁坤, 杨岂深,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Ahnebrink, L. (1961). *The Beginnings of Naturalism in American Fiction*.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 Anderson, C. R. (1997). *Person, Place, and Thing in Henry James's Novels*. Durham, N. 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 Armstrong, P. (2017). *The Phenomenology of Henry Jame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Edel, L. (Ed.). (1984). *Literary Criticism: Essays on Literature, American Writers, English Writers*.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 Felman, S. (1977). Turning the Screw of Interpretation. *Yale French Studies*, 55/56, 94 – 207.
- Gard, R. (Ed.). (1968).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Graham, K. (1975). *Henry James: The Drama of Fulfil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ale, D. J. (2000). James and the Invention of Novel Theory. In Jonathan Freedma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James*, 79 – 101.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James, H. (1962). The Art of Fiction. In James E. Miller (Ed.), *Theory of Fiction: Henry James*, 28 – 64.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James, H. (1934). *The Art of the Novel: Critical prefaces*. (Blackmur, R. P., E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 James, H. (1985). *What Maisie Knew*. London: Penguin Books.
- Nunning, A. (1997). “But Why Will You Say that I Am Mad?”: On the Theory, History, and Signals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British Fiction. *Arbeiten zu Anglistik und Amerikanistik*, 22, 1 – 105.
- Perosa, S. (1978). *Henry James and the Experimental Novel*.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 Phelan, J. (2005).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E. (1948). The Ambiguity of Henry James. In *The Triple Thinkers: Twelve Essays on Literary Subjects*, 88 – 13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王悦, 文学博士,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叙述学、英美文学。

Author:

Wang Yue, Ph. D.,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mainly engaging in narratology and English literature.

Email: wangyue@xmu.edu.cn